

# 一篇包藏祸心的反党黑文

## ——批判梁效炮制的《杜甫的再评论》

成都杜甫草堂文物保管处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在一九七五年第二期《北京大学学报》上抛出了一篇题为《杜甫的再评论》（以下简称《再评论》）的黑文。“瞋目不见丘山”的梁效之流，为什么忽然以研究杜甫的“权威”自居，关心起对杜甫的评论了呢？难道仅仅是“冒充风雅”么？不！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实。《再评论》一文，是为“四人帮”篡权复辟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是一篇包藏祸心的反党黑文。

### （一）

《再评论》是在所谓的“评法批儒”的高潮中出笼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在批林批孔中，不批林，不批孔，却别有用心的大搞所谓“评法批儒”，这本身就是为他们篡权复辟大造舆论。“四人帮”的所谓“批儒”，是以古讽今，通过古人攻击他们妄图打倒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梁效的这篇黑文，正是按照“四人帮”的这个宗旨行事的。《再评论》含沙射影地攻击说：“某些评论者适应反动政治路线的需要，一味颂扬儒家糟粕，不能正确地评论杜甫”。又说：“解放后杜甫研究中尊儒思潮的泛滥，完全是适应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宣扬孔孟之道，开历史倒车的需要。”梁效对从古至今，特别是解放以后对杜甫的研究，恶狠狠地“全面否定”声称要“彻底批判”，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是指桑骂槐，把矛头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众所周知，杜甫是我国唐代的大诗人，他在诗歌领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成都杜甫草堂是诗人的故居，解放以后，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草堂，对杜诗作了“是政治诗”的光辉指示。历年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康生、叶剑英、董必武、李先念、陈毅、郭沫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多次来过草堂，并为草堂写诗、作跋，撰写匾额、楹联。其中，朱德委员长写了“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的题词。叶剑英副主席写了杜诗《前出塞九首》之六之八，诗中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等句。陈毅副总理写了杜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①一联，并在跋语中写道：“此杜诗佳句，最富现实意义，余以千古诗人，诗人千古赞之”。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撰写的题词、跋语（曾在报刊

上发表)，对杜甫及其诗歌作了正确的评价，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是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梁效之流，明知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首长对杜甫的评价，却别有用心地在《再评论》一文中，一律诬蔑攻击为“颂扬儒家糟粕”、“尊儒思潮的泛滥”，其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他们为了攻击陈毅同志，甚至诬蔑杜诗的斗争性“已削减到了可怜的程度”，胡说象“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样“嫉恶如仇的诗句是不很多见的”。梁效的这番表演，犹如“项庄舞剑”，其目的不在评杜，不过是妄想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成“现代的儒”而已！

## (二)

梁效的《再评论》一文，在杜甫所处时代一段中写道：“唐玄宗前期基本上继承了唐太宗、武则天的法家路线，因而出现了‘开元之治’”。同时，又说唐王朝的衰落“正是由于大地主集团抛弃了法家路线，转而推行儒家路线”的结果。真是这样的吗？否！这是赤裸裸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

毛主席教导我们：“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都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创造的。唐王朝的历史也不例外。然而，在梁效的笔下，杜甫所处时代的阶级矛盾没有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存在的只是他们颂扬和膜拜的唐太宗和武则天。这是彻彻底底的历史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值得注意的是，梁效肆意篡改历史，拼命美化帝王将相，特别是竭力粉饰武则天，是有其反动的政治目的的。这些“四人帮”的黑爪牙无孔不入，在这篇所谓评论杜甫的黑文中，也要把其主子江青自比的武则天抬出来。他们硬把唐王朝初期一度出现的兴盛局面归功于这个女皇帝，以博得江青的奖赏。按梁效的逻辑，法家路线“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那么，江青等人推行的“法家路线”，不就是今日中国兴盛的决定因素么？不难看出：“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哪里是在评论杜甫，不过是在利用“杜甫”做文章，借题发挥罢了。

梁效在其黑文中还写道：“杜甫虽然怀着儒家政治抱负，却也受到贞观、开元政治的影响……这些形成了杜甫思想中的进步成分，成为了他诗歌中积极内容的重要思想基础”。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究竟甚么是杜甫思想中的进步成分？我们认为：杜甫之所以成为我国唐代与李白齐名的大诗人，是因为时代把他推到了流离颠沛的人群中，使他接近了劳动人民，从而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了较为深刻的观察，写出了大量的揭露当时的社会矛盾，表达他的政治见解的诗文，因而其诗歌被后世称为“诗史”。这些诗文反映了杜甫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情人民的，这才是他思想中的进步成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因此，就是今天，读读杜诗，对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根本矛

盾，了解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人民生活的苦难，也是不无裨益的。

杜甫的一生，饱经了战乱流离的苦痛。目睹社会的疮痍和民间的疾苦，使他从“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中，吸取了丰富而生动的题材，作为他诗歌创作的源泉。这才是杜诗中积极内容的重要思想基础。我们试就其中的部分诗歌加以具体的分析。

杜甫的青年时代，过着“裘马颇轻狂”②的生活，没有也不可能观察到所谓开元盛世下掩盖着的社会矛盾。他这时写的较好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③，其政治意义也并不深。中年以后，由于他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的贫困，接近了人民，才使他通过自己的“酸辛”体会到了平人的“骚屑”。如果没有“饥饿向一旬”④，“幼子饥已卒”⑤的生活苦况，那是写不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⑥的名句的。如果没有困入敌后看到“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⑦，“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⑧的惨景，更是写不出像《悲青坂》、《悲陈陶》、《塞芦子》以及《北征》等名篇来的。如果没有“老病有孤舟”⑨，“乾坤万里内，不见容身畔”⑩的亲身感受，“此辈杼柚茅茨空”⑪、“鬻男女”⑫、“易子食”⑬等深刻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的诗句，无论如何也是写不出来的，如此等等。杜诗中积极内容的重要思想基础，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吗？

梁效还说：“杜甫青年时代是在开元盛世中度过的，唐代开国到开元年间，法家路线的统治，注意提拔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使他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里，梁效又在为所谓推行法家路线的封建帝王唱赞歌了。实际上，这曲赞歌唱出的谬论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们炮制的杜甫之所以取得诗歌创作的巨大成就，是什么“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⑭的谬论，如出一辙，根本不值得批驳。

梁效在其黑文中，大肆宣扬儒法路线斗争决定杜甫诗歌创作成败的目的，又是在为其主子江青的鬼脸上抹雪花膏。按照梁效的逻辑，在所谓法家帝王执行的法家路线的影响下，杜甫的思想才有了进步成分，其诗歌才有了积极内容，才取得了成就。那么在“当代大作家”江青的影响下，不就可以“文艺繁荣”了吗？江青“呕心沥血”培育了样板戏的神话，不就更能够骗人了吗？什么文化革命的“旗手”、“功臣”之类的桂冠不就可以永远戴到头上了吗？只可惜梁效的这一番苦心，本想博得其主子的青睐，以好加官进爵，不料这一枕黄粱美梦，竟落得个“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⑮的可耻下场。

### (三)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梁效为了证明所谓杜甫“具有严重的儒家思想”，竟堕落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再评论》这篇黑文中写了这样一段黑话：“苏修叛徒集团不是也在杜甫身上大作文章，宣扬什么‘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吗？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需要一切历史垃圾，所以象苍蝇逐臭一样，惯于避开精华的东西，在腐朽的东西上落脚。”这段黑话，表面上似在批驳苏修，实际上是把杜甫的大部分诗歌（其中包括描写战争的

诗歌)诬为“历史垃圾”和“腐朽的东西”。杜甫难道真是因为具有严重的儒家思想而主张无原则的和平和人道吗?我们的结论是否定的。

苏修利用杜诗,宣扬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是驯服可侮的,以达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也曾利用杜诗企图叫我国人民放下武器(见《中日文化》许惕生:《杜甫的反战文学》),这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然而时至今日,“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梁效之流却步其后尘,出卖自己的民族文化,充分暴露了其卖国贼的丑恶嘴脸。

几千年来,我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既爱好和平,也从来不屈服于任何敌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战争。杜甫诗笔下的人民,正是如此。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战争,“贫家女”面对“暮婚晨告别”<sup>①⑥</sup>的应征丈夫,竟能鼓励他“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sup>①⑦</sup>。“子孙阵亡尽”<sup>①⑧</sup>的老人竟以“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sup>①⑨</sup>的坚决态度应征。他们前赴后继,即使“老姬”、“老翁”,“力虽衰”,“骨髓干”了,也要奔赴前线。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正由于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民族才战胜了国内外一切敌人,始终屹立于东亚之滨。

这种伟大坚强的民族精神,使杜甫在其诗歌中较为正确的表达了对各类战争的不同态度。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和睦从来是主要的。但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在天宝年间,唐玄宗穷兵黩武,多次发动对吐番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杜甫对这种不正义的战争是反对的,他在《兵车行》等诗中以“千村万落生荆杞”,“边庭流血成海水”来揭露其破坏生产,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罪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杜甫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而发动的平定藩镇割据和反击少数民族统治者侵扰的战争,是持支持态度的。他“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sup>②⑩</sup>,发出了“欲倾东海洗乾坤”<sup>②⑪</sup>的悲愤。他提出:“乘威灭蜂虿”<sup>②⑫</sup>,以彻底消灭敌人。他呼吁“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sup>②⑬</sup>,“垂泪方投笔,伤时即据鞍”<sup>②⑭</sup>,希望文臣武将们挺身而出以平定叛乱。并且杜甫还时常关心着战局,在《悲青坂》、《塞芦子》等诗中,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意见;在《北征》、《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图状》等诗文中提出了彻底消灭敌人实力的作战策略。由此可见,杜甫在描写战争的大量诗文中,基本上表明了他对待各类战争的正确态度。苏修和梁效之流诬蔑杜甫反对一切战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论新老帝国主义者,或是过去的和现在的卖国贼,妄图在杜甫身上做文章,搞交易,都决不会有好下场,是注定要失败的。

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本能,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梁效之流,为了效忠其主子,公然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评论一个古代诗人的时候,篡改历史,混淆黑白,大搞形而上学,来为其主子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今天,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梁效之流,机关算尽,到头来仍然免不了覆灭的下场。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发扬永远进击,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四人帮”及其写作

班子梁效之流散布的一切反动谬论，批深批臭，使其遗臭万年！

（所引杜甫诗句，均见《杜诗镜铨》）

〔注〕

- ① 《将赴成都草堂寄严郑公五首》
- ② 《壮游》
- ③ 《望岳》
- ④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 ⑤⑥ 《自京赴奉先詠怀五百字》
- ⑦ 《往在》
- ⑧ 《悲陈陶》
- ⑨ 《登岳阳楼》
- ⑩ 《逃难》
- ⑪⑫ 《岁宴行》
- ⑬ 《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
- ⑭ 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表》
- ⑮ 《戏为六绝句》
- ⑯⑰ 《新婚别》
- ⑱⑲ 《垂老别》
- ⑳ 《壮游》
- ㉑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
- ㉒ 《秋日夔州詠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 ㉓ 《送韦十六评事同各防御判官》
- ㉔ 《送杨六判官使西番》

---

（上接第54页）

“女皇”？江青“真是象在梦里嚼树皮”！她这种混帐逻辑，不是正好暴露了她妄图取毛主席和党中央而代之的狂妄野心吗？

毛主席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四人帮”尽管用他们自己的混帐逻辑进行捣乱，但最终还是避免不了他们的失败和灭亡。这才是他们作为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总代表的必然逻辑。让我们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